

钩织合力:海岸带生态环境协同治理 何以可能?

——基于长岛海洋生态文明综合试验区的扎根理论研究

●余静^{1ab,2},徐玥^{1ac},张坤珵^{1ad,2}

(1.中国海洋大学 a.海洋发展研究院 b.海洋与大气学院 c.管理学院 d.马克思主义学院,山东 青岛 266100;
2.自然资源部海岸带科学与综合管理重点实验室,山东 青岛 266061)

摘要:本文旨在研究海岸带生态环境治理中多元主体的协同机制,构建适应新时期的治理模式。生态环境协同治理是实现海岸带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途径,对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深远影响。本文选取长岛海洋生态文明综合试验区为研究案例,运用扎根理论研究方法,构建海岸带生态环境协同治理逻辑的解释框架。研究发现:长岛海岸带生态环境治理是基于“多元参与”,进而实现“协同治理”,实践逻辑表现为多元参与、协同过程和协同结果三个维度。具体而言,政府、企业和社会公众作为主体共同参与,通过协同治理初始条件、协同治理系统环境、协同治理机制设计三个环节的相互作用,实现环境效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融合发展的治理效果。本文的局限性在于单案例研究难以全面反映海岸带治理的复杂性,且未能深入探讨某一具体要素的作用。本文基于协同治理理论和共建共治共享理念,剖析海岸带生态环境治理的实践逻辑,拓宽了社会治理理论在海洋生态领域的实践外延。研究成果为其他海岸带地区完善生态环境治理体系提供了宝贵经验,对加快我国海洋生态文明建设及海洋强国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海岸带;生态环境治理;多元参与;协同治理;扎根理论

中图分类号:P748;X3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6162(2025)04-0146-11

DOI:10.16149/j.cnki.23-1523.20250414.002

1 问题提出

随着生态文明建设和海洋强国建设的提出与推进,我国海洋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力度持续加大。优良的海洋生态环境对生物多样性保护、粮食供应和蓝色碳汇具有重要贡献^[1]。海岸带是我国对外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前沿地带,承载着沿海地区的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对实现海洋强国建设目标具有重要意义^[2]。然而,海岸带地区地理位置特殊,人口集聚和社会经济活动增多导致了资源萎缩、生

态系统功能衰退等问题的产生^[3]。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第14项指出: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海洋及海洋资源以促进可持续发展^[4]。联合国海洋科学促进可持续发展十年(2021—2030),即“海洋十年”指出:理解并战胜海洋污染、保护和恢复生态系统及生物多样性是最紧迫的优先事项^[5]。此外,人海矛盾和生态环境问题带来的负外部性有碍于海岸带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海岸带生态环境治理这一话题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6]。近年来,我国政府对海岸带治理的重视程度不断加深^[7],从党的十八大首次提出“海洋强国”建设,到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构建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主体、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的环境治理体系”,再到“十四五”规划提出“坚持陆海统筹、人海和谐、合作共赢,协同推进海洋生态保护、海洋经济发展和海洋权益维护,加快建设海洋强国”。政策要求逐渐清晰的同时,我国也在积极寻求海岸带生态环境治理的新模式。可见,海岸带生态环境治理不仅是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的核心问题,也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8,9]。

收稿日期:2024-08-29

基金项目:山东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资助项目(22CX SXJ15)

作者简介:余静(1976-),女,中国海洋大学海洋与大气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海洋大学海洋发展研究院研究员,自然资源部海岸带科学与综合管理重点实验室特聘研究员,研究方向:海岸带综合管理;徐玥(1999-),女,中国海洋大学海洋发展研究院、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海洋综合管理;张坤珵(1990-),通信作者,男,中国海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中国海洋大学海洋发展研究院研究员,自然资源部海岸带科学与综合管理重点实验室特聘研究员,研究方向:海洋资源环境管理、海洋生态文明,Email: zkc@ouc.edu.cn。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实现政府治理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10]。2024年1月,《求是》刊发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的讲话,强调要“推进近岸海域污染防治、生态保护修复和岸滩环境整治”“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11]。海岸带生态环境治理理念和方式的变革是加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必要举措,也是构建新时期治理体系、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内在要求。因此,构建多元共治的绿色行动体系,探索协同治理机制,为现代化海岸带生态环境治理模式提供了新的思路。近年来,我国开发利用海洋的强度不断增大,人地、人海矛盾日益突出,利益主体间冲突频发,严重阻碍了海岸带综合治理的进程。究其原因,既与政府组织中各部门权责交叉,存在规划重叠、政策矛盾等问题有关,也与治理过程中其他利益相关主体话语权缺失,难以参与海洋公共事务治理,治理体系本身有待完善密不可分。政府单一主体的治理模式在应对日益复杂的海岸带用途和满足多方需求时显得力不从心。为更好地实现海岸带生态环境治理的价值,需积极打破政府、社会和市场间的交流壁垒,引入多元主体协同治理体系,不仅有利于政府部门制定政策规划、完善制度体系,更有益于妥善处理好各利益主体在海洋公共事务中的关系,牵动社会、市场力量推进海岸带生态环境治理落地实施。因此,有必要构建政府、企业和社会公众协同治理的模式。

协同治理是生态环境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实施基础,但鲜有研究从协同治理理论视角出发,探讨多元主体参与海岸带生态环境治理。据此,本文提出研究问题:在海岸带生态环境治理过程中多元主体间存在怎样的互动逻辑?如何基于协同治理视角对其进行理论阐释?本文以长岛海洋生态文明综合试验区(以下简称“长岛”)为研究对象,运用扎根理论剖析多元主体在海岸带生态环境治理中的协同机制,旨在构建适应新时期的海岸带生态环境治理模式,并为实际治理提供系统的参考与实践指导。

2 文献回顾

2.1 协同治理理论指导海岸带生态环境治理实践

协同治理源于德国理论物理学家赫尔曼·哈肯创立的协同学,是一门融合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新型理论,实现了协同学和治理理论的有效结合^[12]。

协同治理理论认为多元主体协同治理“善治”的形成,需要政府的积极引导,并借助社会组织和个体的力量,构建多中心的协同治理体系,从而兼容多方利益^[13],保证协同机制的长效运作^[14]。ANSELL和GASH于2008年提出了协同治理SFIC模型,认为影响协同治理的四个因素包括初始条件(Starting Conditions)、催化领导(Facilitative Leadership)、制度设计(Institutional Design)、协同过程(Collaborative Process)^[15],为理解和分析协同治理的形成过程提供了一个有效的理论框架。EMERSON等人提出的协同治理综合框架,将协同治理广泛地定义为公共政策决策和管理的过程和结构,进一步推动了协同治理理论的发展^[16]。该框架包括一般系统环境、协同治理机制及其协同动态和行动,认为公众参与、社区合作等“多伙伴治理”都属于协同治理。

2.2 共建共治共享理念下的海岸带治理格局

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是我国社会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彰显“中国之治”的重要载体。自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以来,学者们进行了广泛探讨,深入研究其制度建设^[17]、实践路径^[10,18]、多元主体^[19]等内容。在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时,要把握其“共性”属性,形成多方参与的共治格局^[20]。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已形成清晰的战略规划,但企业与居民等多元社会主体仍需在党和政府的统筹领导下协同发力^[10]。共建共治共享生态治理是中国特色生态治理现代化的历史必然和时代应然,基于多元参与的生态环境保护治理体系更是环境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发展趋向^[21]。我国海岸带综合治理鼓励政府部门与相关企业、社会组织、公众等主体建立合作关系,以多种形式参与海洋生态环境治理。通过主体间积极的互动形成协作关系,使多方主体共同参与海岸带的保护与利用,推动建立地方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的多元共治格局,这与共建共治共享理念相契合。

在传统的海岸带治理过程中,中央与地方政府有关行政管理部门通过制定规划,对海岸带经济、社会活动进行宏观调控^[22]。20世纪70年代以来,社会组织逐渐参与到海洋空间规划中来,提高了社区及公众的参与程度,实现了多元互动合作,被认为是海洋空间规划成功的关键因素^[23]。黄晓春认为,社会组织具有治理和服务功能,能够弥补政府管理的不足与局限^[24]。此外,海岸带生态环境具有公共

物品的属性,公众是优美的海岸带生态环境需求者也是其生态污染的直接受害者,海岸带生态环境治理需要公众的参与和认同^[25,26]。张友浪指出,直接或间接的公众参与均有助于公众向政府部门及时提供服务反馈和服务需求,观察、理解政府机构的运作方式和服务绩效,提高公共管理的质量与合法性,增强公众对管制制度的认同感^[27]。涉海企业在海岸带生态环境治理中同样发挥着重要作用。一方面,涉海企业是海洋环境污染的重要源头,也是海岸带生态环境治理的责任主体,应主动承担生态环境治理的社会责任^[28]。涉海企业借助绿色技术实现升级转型,利用新质生产力赋能海洋经济发展,能够从源头降低资源消耗和污染物排放,有效解决生态问题^[29-31]。另一方面,海岸带生态环境治理依托企业这一主体接受市场的检验,进而满足市场发展要求和经济环境变化,实现长久稳定的发展。可见,多元主体参与符合我国当前海岸带治理的现实需求,也是海岸带地区保护生态、发展经济的前提和关键手段。

共建共治共享理念是新时代生态环境治理的强力保障,有效的环境治理需要多元主体之间的协同合作^[21,32],多元协同是海岸带生态环境治理的理想格局。海岸带生态环境治理是一个涉及多个主体互动的过程,是从单一主导到多元参与,从意愿产生到协同实现的过程,表现为多元参与、协同过程和协同结果三个维度。尽管现有文献对企业、社会组织及公众参与治理提供了研究视角,但研究多针对单个主体参与治理进行分析,未能系统地从实践层面为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提供全面框架。据此,本文采用扎根理论方法,分析长岛的治理实践,构建海岸带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的逻辑框架。

3 研究设计

3.1 研究方法

扎根理论是一种用于识别因素、解读过程、探索复杂问题和研究新生事物的质性方法^[33,34]。多元主体参与为海岸带生态环境治理提供了新的实践指导,主体之间含有复杂的互动机制,适合运用扎根理论开展研究。本文所研究的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是指政府、企业和社会公众作为主体参与海岸带生态环境治理,协同推进海洋强国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在本研究案例中,因公众多借助社会组织的平台参与治理,所以将社会组织和公众视为一类主体,即“社会公众”。本研究采用开放式编码、主轴编码和

选择性编码的思路对原始资料进行程序化扎根,分析文本资料并提炼概念范畴,探索概念范畴之间的逻辑关系,直至理论饱和,得出新的理论^[35]。笔者在三级编码后从数据库中随机抽样,对理论进行饱和度检验,确保编码的信度和所构建理论的可靠性。

3.2 案例选择

依据质性研究案例选取的典型性和代表性原则,本文选取长岛为研究对象,主要考虑以下三点因素:

第一,长岛是我国首批国家级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积极开展海岸带生态环境治理,统筹推进“山水林海城”全域生态保护修复。

第二,2023年12月,山东省政府批复设立长岛“蓝色粮仓”海洋经济开发区。作为全国首个海上经济开发区,长岛坚持“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有机结合,坚持生态优先、共建共享、创新驱动发展,积极参与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有效践行了“两山”理念。

第三,长岛在海岸带生态环境治理过程中倡导多元参与,构建治理共同体的举措和成效具有一定的代表性。长岛为解决多元共治所面对的一系列复杂问题,积极探索多元协同的治理体系,不仅有效提高了社会公众和企业对生态环境治理的认知度及参与度,还构建了生态文明与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范例。

3.3 资料收集

本文依据三角测量的要求,收集多种来源的数据资料,分为一手数据和二手资料两类。海岸带生态环境治理涉及政府部门、企业、社会组织及公众多方参与者,因此,本研究对政府部门官员、企业负责人、社会组织成员及社区居民进行半结构化访谈,所获资料为一手数据主要来源。在访谈问题设计上,除设计“对于海岸带生态环境协同治理,你有什么看法?”等具有共性的问题外,还针对不同访谈对象提出特定问题进行访谈,如对政府部门官员的特定问题为“制定了哪些政策帮助其他主体参与海岸带生态环境治理?”;对企业负责人的特定问题为“您认为企业在海岸带生态环境治理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对社会公众的问题为“社区居民和社会组织是如何参与海岸带生态环境治理的?”“海岸带生态环境治理给您的生活带来了哪些改变?”等。为完善相关资料,笔者不仅借助实地调研、听取会议汇报等方式获取一手数据,还收集了大量二手资料,主要包括互联网资料、部门研究报告、工作记录

和相关政策法规文件。综合一手数据和二手资料建立研究数据库,采用NVivo软件,辅助完成资料的编码工作。表1为一手数据信息统计,表2为二手资料信息统计。

4 数据编码与范畴提炼

4.1 开放式编码

STRAUSS 和 CORBIN 提出的程序化扎根思路,包括开放式编码、主轴编码和选择性编码三个步骤^[36]。开放式编码是将资料分解、检视、比较、概念化和范畴化的过程^[35]。本文将数据资料导入 NVivo 软件,遵循编码原则,对原始资料进行整理和分析,对摘录的相关词句进行编号,并从中发现概念类属。通过开放式编码,本文最终提炼出 45 个初始范畴。

4.2 主轴编码

主轴编码是在开放式编码的基础上,进一步归纳和分析概念类属,建立主范畴和副范畴之间的联系^[37]。本文将开放式编码所获的 45 个初始范畴规整为 14 个副范畴,在进一步剖析副范畴之间的内在联系后,形成了多元主体参与、协同治理初始条件、协同治理系统环境、协同治理机制设计和协同治理效果 5 个主范畴。编码过程如表 3 所示,主轴编码结果如表 4 所示。

4.3 选择性编码

选择性编码需要深入探究并分析主范畴之间的逻辑关系和内在关联,形成一条清楚明确的“故事链”^[38,39]。经过选择性编码,本文对上述 5 个主范畴进行深入分析,将“海岸带生态环境协同治理逻

表 1 一手数据信息统计

类别	一手数据信息	字数(万)
一手数据	长岛自然资源局、长岛生态环境分局、长岛海洋经济促进中心、长岛宣传文化和旅游部官方座谈;长岛小黑山保护发展中心、长岛庙岛保护发展中心深度访谈	2.93
一手数据	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烟台市长岛供电公司、长岛东源海产有限公司深度访谈	2.41
一手数据	长岛南长山街道、北长山街道、北隍城乡居民深度访谈;长岛大黑山乡参与观察及居民深度访谈	2.48
一手数据	净滩小队深度访谈	1.12
一手数据	关于长岛电网规划和新能源发展情况汇报、长岛海洋牧场深化改革案例汇报、长岛国际零碳岛应用场景建设方案汇报	0.85

表 2 二手资料信息统计

类别	编号	二手资料信息	字数(万)
二手资料	A	长岛渔村的美丽蝶变——聚焦山东烟台长岛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	0.28
二手资料	B	全民参与烟台长岛全域生活垃圾 100%分类收集	0.17
二手资料	C	做海岛“生态尖兵”,为美好生活加“分”	0.14
二手资料	D	经略海洋向海图强!看长岛如何探索海岛生态回归新路径	0.14
二手资料	E	从美丽海湾,看见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的“长岛答卷”	0.17
二手资料	F	长岛:打造“蓝色粮仓”,闯出海岛保护开发新路径	0.23
二手资料	G	长岛综合试验区海岸带整治修复工作研究报告	0.27
二手资料	H	长岛绿色电网建设研究报告	0.6
二手资料	I	长岛海草床生态修复研究报告	0.7
二手资料	J	长岛群岛海藻场修复适宜性评估专题研究报告	0.68
二手资料	K	入海污染物治理研究报告	0.81
二手资料	L	长岛海洋碳汇工作记录	0.18
二手资料	M	山东省长岛海洋生态保护条例	0.76
二手资料	N	长岛海洋生态文明综合试验区建设行动计划	0.78
二手资料	O	全国海洋主体功能区规划	1.3
二手资料	P	关于进一步支持长岛海洋生态文明综合试验区建设的若干政策措施	0.32
二手资料	Q	长岛海洋生态文明试验区“十四五”生态环境保护规划	2.4
二手资料	R	关于构建现代环境治理体系的指导意见	0.44

辑”确定为核心范畴,其故事线为:我国海岸带生态环境治理基于“多元主体”,实现“协同治理”,包括多元参与逻辑、协同过程逻辑和协同结果逻辑三条逻辑线。具体而言,政府、企业和社会公众采取一系列措施参与生态环境治理,在面临主体需求、既往合作及冲突形成的协同治理初始条件下,经过外部系统环境和协同治理机制的共同作用,实现良好的协同治理效果。本文依据“故事链”,构建出海岸带生态环境协同治理逻辑的解释框架(如图1所示)。在生态文明建设及海洋强国建设的背景下,海岸带生态环境协同治理模式是我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表现。

4.4 理论饱和度检验

为保证编码的充分性和理论模型的有效性,需

要对编码结果进行理论饱和度检验,主要从效度和信度两个方面进行^[40]。为了提高效度,本文采用了以下两个方法:一是在编码完成后,在一手数据和二手资料中,各随机抽取三份样本,进行逐级编码,编码结果没有产生新的概念和范畴,且范畴之间未产生其他关联关系;二是邀请海岸带生态环境领域的专家对编码结果和框架进行研讨,并按照修改意见进行调整。本文采用以下三个方法提高信度:第一,数据来源广泛,符合三角验证原则;第二,共有三名编码员进行独立编码,在意见不一时及时进行讨论,直至看法和结果总体一致。第三,邀请领域专家参与编码并进行指导,进一步提高结果的信度。此外,笔者将研究结果同另外两名编码员和领域专家进行研讨,未得到新的范畴和关系,保障了编码的信度^[41]。

表3 编码过程示例

类型	原始资料	初始范畴	副范畴	主范畴
一手数据	我们村里都有志愿者队伍,定期去海滩捡垃圾……参与的村民也挺多	公众参与	全民参与	多元主体参与
一手数据	海洋牧场修复海草床、海藻场,用海草床、海藻场的碳汇进行贷款,让原本看不见、摸不着的海洋蓝碳变身为真金白银	利益追求	主体需求	协同治理初始条件
一手数据	把海洋生态文明建设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把开发活动严格限制在海洋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范围内,维护好海域、海岛、海岸线自然状况,保护好海洋生物多样性	生态文明建设	政策制度条件	协同治理系统环境
一手数据	因划定禁养区、限养区造成养殖户损失的,应当依法予以合理补偿	生态补偿机制	经济导向的市场化机制	协同治理机制设计
一手数据	逐渐实现了水清滩净、鱼鸥翔集、人海和谐的景象	环境质量改善	环境效益	协同治理效果

表4 主轴编码结果

主范畴	副范畴	初始范畴
多元主体参与	统筹负责	顶层设计、行政调节
	绿色转型	结构升级、企业责任
协同治理初始条件	全民参与	公众认知、公众参与
	主体需求	任务压力、美好环境、利益追求
协同治理系统环境	既往历史	信任基础、利益诉求、价值观念
	政策制度条件	陆海统筹发展、生态文明建设、海洋强国建设、现代环境治理体系
协同治理机制设计	经济文化水平	经济结构、产业布局、文化传承、教育理念
	生态系统基础	生态系统抵抗力、生态系统适应力、生态系统恢复力、生态系统服务功能
协同治理效果	经济导向的市场机制	生态补偿机制、蓝碳交易机制、奖励惩罚机制、排污交易机制
	技术导向的配置机制	信息共享机制、资金保障机制、人力配置机制、物资调配机制
	任务导向的保障机制	监督检查机制、监察问责机制、考核评价机制、生态修复机制
	环境效益	生态功能恢复、环境质量改善、生物多样性增加
	社会效益	治理能力增强、多方利益均衡、治理效率提高
	经济效益	绿色经济、成本分摊、经济可持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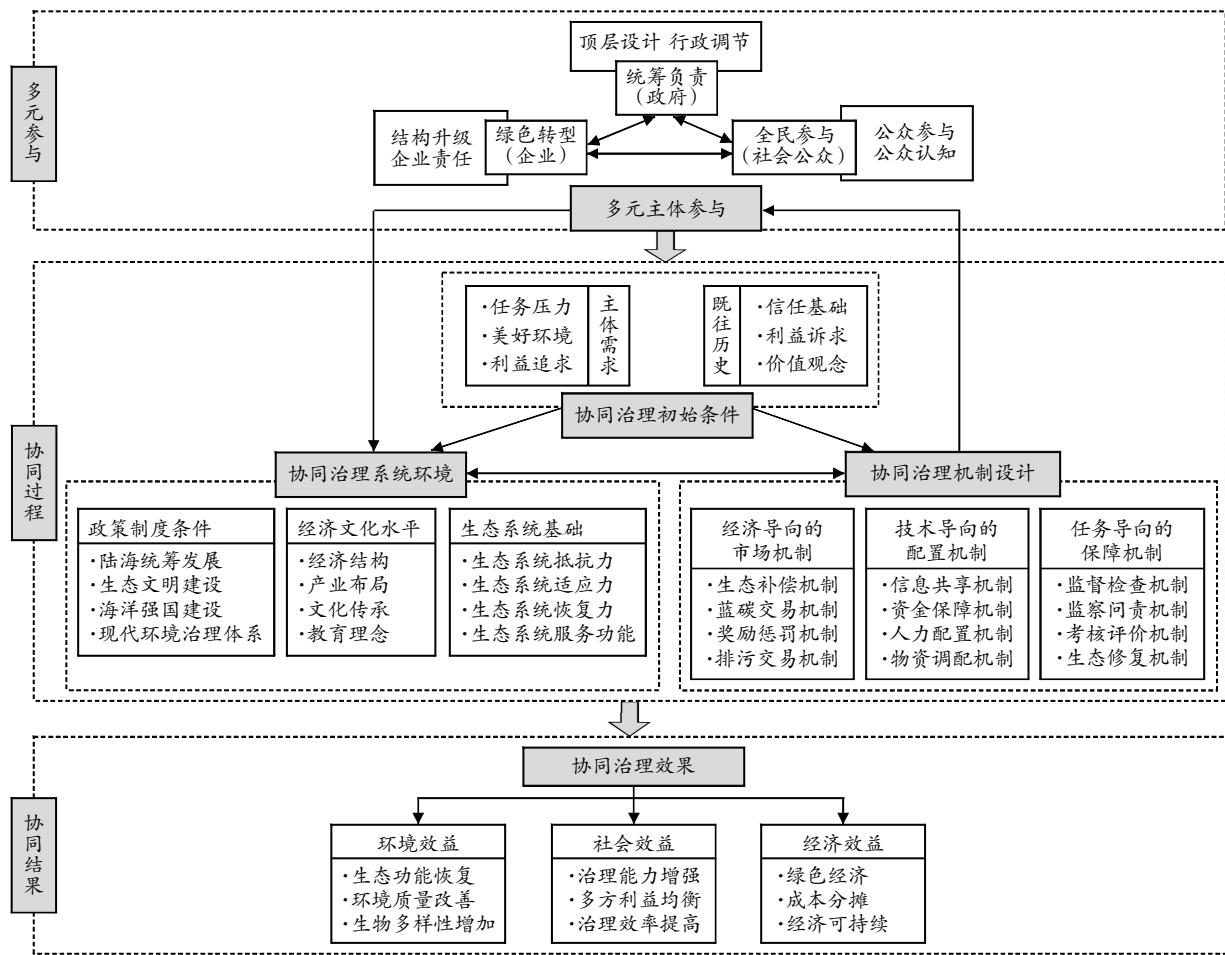


图1 海岸带生态环境协同治理逻辑的解释框架

5 海岸带生态环境协同治理逻辑的理论阐述

本文通过扎根方法分析,构建了海岸带生态环境协同治理逻辑的解释框架,包括多元参与、协同过程和协同结果三个维度,由多元主体参与、协同治理初始条件、协同治理系统环境、协同治理机制设计和协同治理效果五部分共同组成。

5.1 多元参与逻辑

随着“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的提出,社会组织、公众等主体逐渐参与到我国公共管理活动中,形成互动式治理新模式^[42]。多元参与是生态环境治理理念和方式变革的重要内容,我国海岸带综合治理鼓励政府部门与企业、公众等主体建立合作关系,通过主体间积极的伙伴关系形成协同效应,共同参与海岸带生态环境的保护与利用。

政府在生态环境治理中发挥统筹负责的作用,通过顶层设计制定生态环境治理的总体规划和战略方向,确保各项治理措施的系统性和科学性^[43]。同时,政府通过行政调节调动各部门和企业、社会公众的参与,确保治理行动的全面落实,推动政策的具体实施和整体目标的实现。

“生态文明建设就像是为我们的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部门会通过具体的行动,比如宣传教育、监督检查等,来推动政策落地和执行,让大家一起参与进来,共同保护环境,这样才能真正把海岸带的生态环境治理好。”(访谈记录:长岛宣传文化和旅游部宣传科科长 NYJ20240802^①)

企业积极进行绿色转型,实现结构升级,向低碳、环保的生产模式转变,从源头上减少对环境的负面影响^[44]。此外,企业主体在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积极参与生态环境治理,承担企业社会责任,为生态环境的改善提供了重要推动作用。

“前几年,我们全岛就进行‘煤改电’了,把高碳

^①访谈记录编码规则:被访者身份信息+被访者姓名汉语拼音首字母+访谈时间(八位数字,前四位为年份,后四位为日期,如20240101为2024年1月1日)。

排放的问题给解决了。入海污水的排放要求提高,企业就要增加净化设备,把污染从源头上防住了。也有爱心企业对环境治理进行资助,保障环境治理工作,这对企业形象也是有提升的。”(访谈记录:长岛南长山街道副主任 ZK20240806)

全民参与是生态环境治理和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基础^[45],公众认知度的提高是积极参与治理的前提,公众的自觉监督与广泛参与不仅增强了治理的社会基础,也推动了治理过程的公开透明^[46]。同时,具有公益属性的社会组织为公众参与海岸带生态环境治理提供了沟通交流的平台。

“我们全岛居民都参与垃圾分类,也会有志愿组织来宣讲垃圾分类的相关知识,确保正确投放垃圾,居民逐渐养成垃圾分类的意识,参与的积极性也得到了很大的提高。”(访谈记录:长岛南长山街道居民 ZX20240809)

进一步探究发现,在海岸带生态环境治理过程中,政府、企业和社会公众分别承担主导者、执行者和监督者的角色,在经济导向的市场机制、技术导向的配置机制及任务导向的保障机制作用下,形成多元共治的格局(如图 2 所示)。依据参与主体的功能及参与情况,可以将协同模式分为政府主导-企业协同型、政府主导-社会公众自治型、市场化体系-全民参与型三种模式。

5.1.1 政府主导-企业协同型

政企合作是一个政府与企业之间双向的互动过程,已成为推动公共价值共创的主要力量。一方面,政府部门通过制度来明确和驱动企业进行绿色技术的探索实施,坚持绿色共享、和谐共生理念,构建“生态融合”政企联动模式^[4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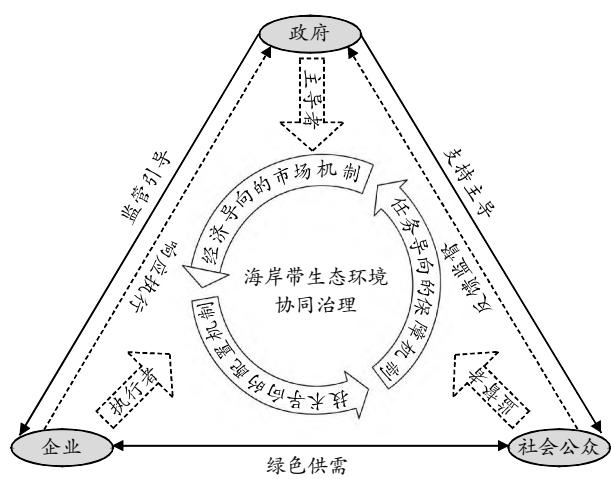


图 2 多元主体协作关系

“将生态电网建设嵌入政府‘零碳海岛’规划,打造政企联动、相关方利益共享生态圈,以电网可持续发展之道创生物多样之美。”(访谈记录: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烟台市长岛供电公司发展部副主任 GH20240804)

另一方面,企业在政府政策的引导下积极响应和执行^[48],进行“海草床、海藻场碳汇贷”,将海洋生态系统的碳吸收能力转换为经济价值,不仅为企业注入了新的经济动能,也推动了绿色水产养殖业等海洋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原本看不见、摸不着的海洋蓝碳成功变身‘真金白银’,好生态可以带来好‘钱’景,我们依靠海草床、海藻场碳汇贷,解了企业之渴。”(访谈记录:长岛东源海产有限公司 SCW20240722)

5.1.2 政府主导-社会公众自治型

层级化管理结构不仅确保地方政府能够根据区域特性进行精准治理,提高了管理的灵活性和地方适应性,还通过增强公众的参与感和责任感,推动更为有效的生态环境保护,实现了政府与公众的协同治理。

“海岸线的岸段划分到不同的责任部门跟乡镇手里,乡镇会再把权力下放到村集体和公众手里,他们要做好日常的生态环境治理工作。”(访谈记录:长岛生态环境分局科员 WZC20240802)

公众和社会组织的共同认可是自治治理的重要因素^[49]。在认同的基础上进行社会公众自治,有利于激发地方社区和公众的感知和参与积极性^[46]。

“我们村里就有净滩队伍,定期开展到沙滩上捡垃圾的活动,大家都清楚有了好的环境,旅游业、渔业养殖业收益也跟着好了,参与也很积极。”(访谈记录:北隍城乡应急与执法大队队长 ZH20240805)

5.1.3 市场化体系-全民参与型

环保企业的市场化运营为公众参与生态环境治理注入了新的活力,相关激励机制的引入,有效推动了全民参与垃圾分类。

“借助企业的市场化运营,构建‘投放-收集-运输-处置’全过程闭环式垃圾分类运行体系,从街道到渔村,每家每户办理积分卡,全岛居民参与垃圾分类,正确投放垃圾后可以获得积分,用来兑换生活用品。”(二手资料文本:第 B3 句语段)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有效治理生活垃圾能够持续改善海洋生态环境质量,让人民群众更好地享受碧海蓝天、洁净沙滩。通过引入市场化团队,并推出积分奖励制度,不仅提高了垃

圾分类的准确性和效率，还激发了全民的环保意识，形成了人人参与、共建生态的良好局面，为生态环境治理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5.2 协同过程逻辑

5.2.1 协同治理初始条件

首先，多元主体的需求是开展海岸带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的先决条件。国家战略、相关政策制度、规划目标在指引政府行动的同时，也带来了一定任务压力，促使各级部门积极参与海岸带生态环境的保护与治理^[49]。对于企业而言，碳汇交易、绿色金融、生态补贴等经济激励带来了可观的收益，将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实现有效结合，既降低了企业在生态环境治理中的成本，又提高了参与积极性。对于社会公众，其需求主要为对优良海岸环境及健康生活的需要。

“政策明确提出要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力度，我们就设定了具体的减排目标和生态修复任务，每项环保工作，规定我们在一定时间段内必须完成，是有指标考核压力的。我们有专项资金对整改的企业、居民进行生态补贴。我们岛也推动‘碳汇贷’的落地，已经有企业实现依靠海草床、海藻场碳汇贷款了，可见生态效益也是能转化为经济效益的。对公众来说，需要的就是美好的环境，把污染治理了，亲海环境就好了。”（访谈记录：长岛自然资源局科员 LYX20240806）

其次，主体间合作及冲突既往史也会对协同治理产生影响。冲突导致主体间信任水平低，协同治理也难达成；既往的合作则会增强主体间的信任水平，有利于达成协同治理。若各主体之间存在共同的利益诉求和价值观念，那么这将有利于协同的开展；反之，就可能对协同形成阻碍。

“污水排放入海直接导致亲海环境变差了，对海里的鱼类、贝类影响也不好，渔民的收入也受到影响，冲突就来了，居民就向政府反映情况，举报我们企业。政府后面就与我们沟通，请专家给我们提供技术指导，改善生产流程，减少排放污染。但是进行环保整改，我们企业就得购买环保设备、进行废物处理等，这些措施虽然能提高环境质量，但短期内我们的生产成本上升很多，经济效益也受到负面影响。”（访谈记录：长岛东源海产有限公司 SCW20240722）

5.2.2 协同治理系统环境

协同治理并不是在封闭的环境中进行的，是在政治、经济、社会等多重背景下发起并发展的。对于

海岸带这一生态敏感区，自然生态环境的影响也是至关重要的。因此，在海岸带生态环境治理过程中，良好的政策制度条件、经济文化水平和生态系统基础是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推动力。

一是政策制度条件。良好的政策制度条件为生态环境协同治理提供了制度保障和行动指南，科学合理的政策促进了多元主体的协同合作，政策的持续推进与创新增强了治理的可持续性和系统性^[48]。

“构建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主体、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的环境治理体系，为建设美丽中国提供有力制度保障。”（二手资料文本：第 R1 句语段）

二是经济文化水平。合理的产业布局和经济结构提高了资源利用效率，减少了环境污染，并为环境治理提供了充足的资金和技术支持。先进的文化理念增强了公众的环保意识，鼓励社会广泛参与治理，推动生态环境的整体改善。

“以前居民是以捕捞业、养殖业为主，现在大家都开始往旅游业发展，开办渔家乐和民宿，从事第三产业的比较多了，聚集在南长山岛这边。旅游能发展起来也主要是因为我们这边环境好，大家对环境也重视起来了，素质也提升了不少。”（访谈记录：长岛南长山街道居民 ZX20240807）

三是生态系统基础。生态系统抵抗力和适应力使生态系统能够有效应对外部压力，而良好的恢复力则保障生态系统在受干扰后进行调节，保障治理效果。同时，丰富的生态服务功能为人类提供资源和支持，促进治理措施的有效实施，确保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生态系统给我们提供物质、服务，直接影响我们的生活质量，而且生态环境是有自我调节作用的，基础好的生态环境的调节能力强，我们治理起来也容易些，生态基础不好，治理起来难度也大。”（访谈记录：长岛自然资源局科员 LYX20240806）

5.2.3 协同治理机制设计

海岸带生态环境治理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涉及多方主体，需要借助完善的协同治理机制，整合多方主体资源与力量，提高协调效率和治理效果，推动生态环境的全面和可持续治理^[50]。

一是经济导向的市场机制。市场化手段能够有效促进生态环境治理，生态补偿机制和蓝碳交易机制对保护生态的行为给予经济回报，排污交易机制对污染物减排起到一定作用，奖励惩罚机制确保了对良好环保行为的奖励和不当行为的惩罚。

“充分利用财政补贴和风险补偿金的方式，对

深远海养殖企业开展政策性补贴,或者以财政贴息方式鼓励政策性银行向从事深远海养殖相关企业提供贷款。”(汇报记录:第 52 句语段)

二是技术导向的配置机制。通过技术赋能,建立信息共享机制,有效缓解主体间信息不对称现象;资金保障机制为各主体提供了必要的资金支持,确保生态环境治理行为的持续进行;人力配置机制优化了人力资源的引入和部署,提高治理效率和技术水平;物资调配机制确保资源和设备的及时供应,避免主体间物质资源不对称现象的产生。

“建立跨层级、跨部门的统一数据信息平台,实现环境质量、污染源和生态状况的实时监测和数据共享,公众可以通过平台举报环境问题,政府部门及时获取信息并采取行动。建立生态环境应急物资储备库,在应对突发环境事件时,能够迅速调配所需资金、人力、物力,实现资源的共享和优化配置。”(访谈记录:长岛生态环境分局科员 WZC20240802)

三是任务导向的保障机制。通过建立监督检查机制、监察问责机制、考核评价机制,对协同治理进行监督、问责和评估等措施;生态修复机制的建立使得生态环境在受到损害时得到及时治理。四者紧密结合,共同保障了海岸带生态协同治理的效果。

“各职能部门落实环境保护责任,建立相应的工作推进机制,做到各项目标任务可量化、可考核……完善企业环境保护‘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机制。”(二手资料文本:第 K121 句语段)

5.3 协同结果逻辑

对于海岸带这一生态敏感区而言,社会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并重,生态环境治理的效果不应单一考虑环境效益,也要对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进行综合衡量,三者相互促进,共同推动生态环境治理的整体效能。

5.3.1 环境效益

通过有效的治理措施,陆源污染及海洋污染得到统筹控制,环境质量显著改善,生态环境的物质供给和服务功能得以恢复,物种丰富度逐渐增加。

“鲍鱼等野生海珍品,渤海刀鱼等传统经济鱼类资源不同程度出现恢复,有效改善了海岛的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提高了生态系统的稳定性。”(二手资料文本:第 D11 句语段)

5.3.2 社会效益

借助政府部门、企业和社会公众主体的力量,有效应对生态环境问题,治理能力增强。协同机制

的保障使得主体间及时沟通与合作,避免了利益冲突的产生,推动了资源的优化配置,治理效率实现提高。

“在治理海滩污染问题上,政府会提供一定资金支持,企业负责清洁技术研发和实施,社会公众积极监督和参与。通过共同努力,不仅减少了治理过程中的利益冲突,还提高了治理的透明度和效率,实现海岸线环境的显著改善。”(访谈记录:长岛庙岛保护发展中心副主任 ZXS20240803)

5.3.3 经济效益

清洁生产和可再生能源的使用有效控制污染物排放,产业布局和结构的调整促进绿色经济发展,利用有限的资源与空间,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此外,多元主体协同参与使得治理成本分摊,降低单一主体的经济压力。

“企业通过引入清洁技术、优化生产方式等升级转型,减少污染,实现绿色发展。同时,也减小了对治理企业生产污染的投入。”(访谈记录:长岛海洋经济促进中心副主任 YTZ20240805)

综上可知,基于多元主体实现协同治理是海岸带生态环境治理的理想模式。政府、企业和社会公众的参与促进协同治理系统环境的形成,主体需求及既往历史形成协同治理的初始条件,推动协同治理系统环境和协同治理机制的生成。同时,系统环境会塑造整体协同治理机制,机制也可以通过其协同行动影响系统环境。此外,协同治理机制设计进一步保障了多元主体的参与。通过多方合作,最终实现环境效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共赢。

6 结论与讨论

本文采用扎根理论方法,分析长岛海洋生态文明综合试验区的海岸带生态环境治理实践,以协同治理理论、共建共治共享理念为基础,构建起海岸带生态环境协同治理逻辑的解释框架。政府、企业和社会公众作为多元主体协同共治海岸带生态环境,表现为多元参与、协同过程和协同结果三条逻辑线。多元参与关注政府、企业和社会公众主体采取各类措施,参与生态环境治理;协同过程关注协同治理的发起和发展,包括协同治理初始条件、协同治理系统环境和协同治理机制设计三大环节;协同结果聚焦治理效果,实现环境效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多赢局面。由此,基于多元主体实现协同治理,构成多元主体参与海岸带生态环境治理逻辑。

本文的理论贡献在于构建了海岸带生态环境协同治理逻辑的解释框架。现有学者多采取宏观研究分析海岸带生态环境治理,缺少对典型案例的深度调研,难以从微观层面探索实践逻辑。此外,当前研究虽然对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的主体、经验、现实困境等方面进行了有益探索,但缺少对相关理论的阐释。本文对田野调查所取得的一手数据和收集到的大量二手资料进行扎根分析,丰富了扎根理论在海洋领域的应用场景。本研究的实践价值在于采用扎根理论方法分析长岛实践,探索出多元主体参与海岸带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的实践逻辑,不仅符合我国海洋强国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双重目标,也为其他海岸带地区完善现代化社会治理体系提供了宝贵经验。

本文构建海岸带生态环境“多元主体参与-协同治理初始条件-协同治理系统环境-协同治理机制设计-协同治理效果”的协同治理逻辑,并得出以下启示:一是统合多元主体的治理力量。在具体实践中,公共管理者要健全协同治理机制,盘活企业及社会公众的力量,调动主体参与积极性,共建共治共享优良的海岸带生态环境,进一步为协同治理提供良好的系统环境,促进协同治理的长效运作。二是确保各实践环节的有效实行。多元主体参与是协同治理发起的前提,在协同治理初始条件、协同治理系统环境、协同治理机制设计三个环节的相互作用下,实现环境、社会和经济效益融合发展的协同治理效果。在实践中,要厘清协同治理逻辑,确保多元主体参与、适配系统环境、完善机制设计等环节的有效实行,以实现良好的治理效果。

尽管本文探讨了海岸带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的实践逻辑,构建了由多元参与、协同过程和协同结果三个维度共同组成的解释框架,但仍存在以下局限:一是由于涉及多元主体和复杂治理过程,本文未能深入探讨某一具体议题,如市场机制、行政动员等因素的影响,未来研究应更深入地挖掘具体要素对协同治理的影响机制。二是尽管本案例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但单个案例难以全面反映海岸带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的复杂性。因此,后续研究应考虑尝试多案例分析方法,持续探索并印证多元主体协同参与海岸带生态环境治理的机制。

参考文献:

- [1] SALA E, MAYORGA J, BRADLEY D, et al. Protecting the Global Ocean for Biodiversity, Food and Climate [J]. *Nature*, 2021, 592 (7856):397–402.
- [2] 李彦平,刘大海. 基于生态文明价值导向的海岸带空间用途管制的思考[J]. *环境保护*, 2020, 48(21):31–35.
- [3] 赵领娣,孙兆旭. 海岸带城市经济发展质量与生态韧性协同发展演化及空间收敛特征[J]. *经济地理*, 2023, 43(7):119–129.
- [4] VIRTO L R. A Preliminary Assessment of the Indicators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 (SDG) 14 “Conserve and Sustainably Use the Oceans, Seas and Marine Resources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J]. *Marine Policy*, 2018, 98: 47–57.
- [5] 管松,于莹,乔方利.“联合国海洋科学促进可持续发展十年”:内容与评述[J]. *海洋学报*, 2021, 43(1):155–164.
- [6] LIU L, WANG H J, YUE Q. China’s Coastal Wetlands: Ecological Challenges, Restoration, and Management Suggestions [J]. *Regional Studies in Marine Science*, 2020, 37:101337.
- [7] 盖美,岳鹏,徐晶晶,等. 基于人地系统视角的海岸带韧性解构与测度[J]. *地理研究*, 2023, 42(10):2605–2621.
- [8] 袁涵蒙,唐豪,许植桐,等. 陆海统筹视角下滨海地区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路径与实践[J]. *规划师*, 2024, 40(2):89–97.
- [9] 杨振姣,闫海楠,王斌. 中国海洋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的国际经验与启示[J]. *太平洋学报*, 2017, 25(4):81–93.
- [10] 习近平.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二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23.
- [11] 习近平. 以美丽中国建设全面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J]. *求是*, 2024(1):4–9.
- [12] [德]赫尔曼·哈肯. 协同学——大自然构成的奥秘[M],凌复华,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5.
- [13] 郑巧,肖文涛. 协同治理:服务型政府的治道逻辑[J]. *中国行政管理*, 2008(7):48–53.
- [14] 张振波. 论协同治理的生成逻辑与建构路径[J]. *中国行政管理*, 2015(1):58–61.
- [15] ANSELL C, GASH A.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in Theory and Practice [J].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search and Theory*, 2008, 18(4):543–571.
- [16] EMERSON K, NABATCHI T, BALOGH S. An Integrative Framework for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J].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search and Theory*, 2012, 22(1):1–29.
- [17] 王春城,郭一文.“共建共治共享”的乡村治理共同体何以建构[J]. *河北学刊*, 2025, 45(1):193–201.
- [18] 姚树荣,周诗雨. 乡村振兴的共建共治共享路径研究[J]. *中国农村经济*, 2020 (2):14–29.
- [19] 刘海鸥,何旭涛,高悦,等. 共建·共治·共享:区块链生态赋能双创空间多元联动协同发展研究[J]. *中国科技论坛*, 2022(1):104–111.
- [20] 廖天虎. 我国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制度的完善及拓展[J]. *人民论坛*, 2024(19):59–61.
- [21] 张静. 新时代生态环境治理体系视域下的共建共治共享研究[J]. *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 49(6):93–108.
- [22] SANDSTRÖM A, BODIN Ö, CRONA B. Network Governance from the Top—The Case of Ecosystem-based Coastal and Marine

- Management[J]. *Marine Policy*, 2015, 55: 57–63.
- [23] 许莉. 国外海洋空间规划编制技术方法对海洋功能区划的启示[J]. *海洋开发与管理*, 2015, 32(9): 28–31.
- [24] 黄晓春. 中国社会组织成长条件的再思考——一个总体性理论视角[J]. *社会学研究*, 2017, 32(1): 101–124.
- [25] 王琪, 毛杨. 海洋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的逻辑动因、现实困境及纾解路径[J]. *环境保护*, 2024, 52(1): 50–55.
- [26] 李京梅, 郝阳. 基于新经济社会学视角的海洋垃圾公众治理意愿研究[J]. *海洋开发与管理*, 2023, 40(12): 87–96.
- [27] 张友浪. 公共服务中的公民参与[J]. *公共管理评论*, 2020, 2(2): 149–159.
- [28] 颜雅琦, 丰慧, 陈先明, 等. 多方协同下大江大河水生态治理牵头企业特殊社会责任内涵与实现机制[J]. *水利经济*, 2024, 42(2): 92–100.
- [29] 全永波, 金纪岚. 海洋新质生产力赋能海洋环境治理的理论逻辑、关键问题与推进路径[J]. *海洋开发与管理*, 2024, 41(6): 87–95; 1–9.
- [30] 解学梅, 朱琪玮. 企业绿色创新实践如何破解“和谐共生”难题? [J]. *管理世界*, 2021, 37(1): 128–149.
- [31] CHEN F, WANG M, PU Z. The Impact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on Air Pollution: Firm-level Evidence from China [J]. *Technological Forecasting and Social Change*, 2022, 177: 121521.
- [32] 陈静, 黄萃, 苏竣. 数字技术赋能与协同治理网络: 基于 J 市环境治理实践的分析[J]. *公共行政评论*, 2024, 17(4): 55–72.
- [33] 熊烨. 我国地方政策转移中的政策“再建构”研究——基于江苏省一个地级市河长制转移的扎根理论分析[J]. *公共管理学报*, 2019, 16(3): 131–144.
- [34] CHARMAZ K, THORNBERG R. The Pursuit of Quality in Grounded Theory[J]. *Qualitative Research in Psychology*, 2021, 18(3): 305–327.
- [35] 李辉, 黄雅卓, 徐美肖, 等. “避害型”府际合作何以可能? ——基于京津冀大气污染联防联控的扎根理论研究[J]. *公共管理学报*, 2020, 17(4): 53–61.
- [36] STRAUSS A, CORBIN J. *Basic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Grounded Theory Procedures and Techniques* [M]. Newbury Park: Sage, 1990.
- [37] 傅利平, 王奕辉, 徐小凤, 等. 健康需求与协同治理: 分级诊疗制度建设实践逻辑——基于公共价值视角的扎根理论研究[J]. *公共管理学报*, 2024, 21(3): 111–123.
- [38] CHAMETZKY B. Coding in Classic Grounded Theory: I've Done an Interview; Now What? [J]. *Grounded Theory Review*, 2022, 21(2): 22–32.
- [39] 吴毅, 吴刚, 马颂歌. 扎根理论的起源、流派与应用方法述评——基于工作场所学习的案例分析[J]. *远程教育杂志*, 2016, 35(3): 32–41.
- [40] 汪曲, 许渝. 何以驱动基层公务员担当作为: 基于扎根理论的质性研究[J]. *公共管理与政策评论*, 2022, 11(5): 42–60.
- [41] 张绪娥, 温锋华, 唐正霞. 由合作生产到价值共创的社区更新何以可行? ——以北京“劲松模式”为例[J]. *公共管理学报*, 2023, 20(1): 144–156.
- [42] 王佃利, 孙妍. 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与城市街道的“嵌入式”改革——以青岛市街道办改革为例[J]. *公共管理与政策评论*, 2020, 9(5): 47–57.
- [43] 刘大海, 邢文秀, 李彦平, 等. 海岸带规划的管制框架、核心管控边界及权责关系——以山东省为例[J]. *城市规划学刊*, 2022(2): 20–26.
- [44] 唐亮, 姜海锋, 郑军, 等. 生态法治建设如何引领绿色发展转型: 新《环保法》实施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J]. *中国软科学*, 2023(8): 43–53.
- [45] 邝奕轩. 多元主体参与绿色经济发展研究——以洞庭湖生态经济区为例[J]. *求索*, 2024(3): 124–133.
- [46] 南锐, 陈蒙. 基于扎根理论的城市基层社会治理公众参与有效性研究——来自北京市垃圾分类治理经验的证据[J]. *行政论坛*, 2022, 29(3): 120–130.
- [47] 李哲, 薛淞. 政府环境影响评价制度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J]. *金融研究*, 2024(3): 94–112.
- [48] 徐妍, 宋怡瑾, 邵帅. 低碳转型政策对上市公司环境-社会责任-公司治理的影响及作用机制[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24, 34(4): 60–75.
- [49] 魏昕伊, 胡求光, 马劲韬. 海洋生态文明建设能否改善海岸带环境——来自国家海洋生态文明示范区的证据[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23, 33(9): 123–133.
- [50] 芮晓霞, 周小亮. 水污染协同治理系统构成与协同度分析——以闽江流域为例[J]. *中国行政管理*, 2020(11): 76–82.

(11) The Logic of Intergovernmental Non–Coordination: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s, Inter–Actor Relations, and Cross–Domain Governance Action Strategies

—An Examination of the Joint Air Pollution Prevention and Control Mechanism in the Yangtze River Urban Agglomeration

Wu Xuhong^{1ab}, Hu Yue^{1ab}, Ning Chao² · 129 ·

(1a. School of Management, Lanzhou University, Lanzhou, 730000, China;

1b. China Center for Government Performance Management Research, Lanzhou University, Lanzhou, 730000, China;

2. School of Public Affairs, Nanj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Nanjing, 210094, China)

Abstract ID: 1672–6162(2025)04–0129–EA

Abstract: Intergovernmental collaboration is a pivotal mechanism for advancing cross–regional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Existing research has largely focused on the theoretical dimensions of intergovernmental cooperation, while comprehensive analyses of the mechanisms driving non–coordination remain scarce. Drawing on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theory and institutional collective action theory, this study proposes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actor relations – governance structure – action strategies." Using this framework, it systematically examines intergovernmental collaboration in air pollution control across the Yangtze River Urban Agglomeration, with particular emphasis on the deep–rooted causes of coordination dilemmas. The findings indicate that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in this context faces four major challenges: inadequate implementation of policy objectives and assigned responsibilities; intergovernmental competition over interests that erodes the willingness to collaborate; the absence of operational mechanisms within key coordinating institutions; and mismatches between governance objectives and collaborative capacities. These challenges originate from disparities in collaborative capacity stemming from competitive relationships and unequal resource endowments; limitations in authority allocation and incomplete institutional mechanisms that constrain agreement formation and joint action; and institutional constraints – such as pressure–driven performance systems and fiscal limitations that weaken the perceived benefits of cooperation. Moreover, the inherent coordination costs further obstruct the achievement of collective goals and action strategies. To establish a sustainable and effective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mechanism, it is essential to build stronger consensus among stakeholders, redesign governance structures to align authority with responsibility, and refine performance assessment standards for regional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Article Type: Research Paper

Key Words: Intergovernmental Non–Coordination, Cross–Regional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Coordination Dilemmas, Actor Relations and Governance Structure, Yangtze River Urban Agglomeration

(12) Weaving Synergy: How is Synergistic Governance of Coastal Ecological Environments Possible?

—A Grounded Theory Study of the Marine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mprehensive Experimental Area of Changdao

Yu Jing^{1,2,3}, Xu Yue^{3,4}, Zhang Kuncheng^{2,3,5} · 146 ·

(1. College of Oceanic and Atmospheric Sciences, Ocean University of China, Qingdao, 266100, China;

2. Key Laboratory of Coastal Science and Integrated Management, MNR, Qingdao, 266061, China;

3. Institute of Marine Development, Ocean University of China, Qingdao, 266100, China;

4. Management College, Ocean University of China, Qingdao, 266100, China;

5. School of Marxism, Ocean University of China, Qingdao, 266100, China)

Abstract ID: 1672–6162(2025)04–0146–EA

Abstract: The objective of this paper is to study the synergistic mechanism of multiple subjects in the ec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of the coastal zone, and to construct a governance model adapted to the new period. Collaborative ec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is essential fo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coastal zones. It has profound implications on upholding and improving social governance system based on collaboration, participation, and common interests and for advancing modernization of China's system and capacity for governance.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Marine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mprehensive Experimental Area of Changdao through a grounded theory approach, constructing an explanatory framework for the logic of coastal ec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Findings indicate that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in Changdao is driven

by "multi-stakeholder participation", which enables "synergetic governance". The governance unfolds across three dimensions of pluralistic participation, synergistic process and synergistic outcomes. Specifically, the involvement of government, enterprises and the public established the foundation for synergistic governance. This process is structured through three components: initial conditions, governance mechanisms and system environment. Ultimately, these interactions yield integrated environmental, social, and economic benefits. The limitations of the study are that it is difficult to fully reflect the complexity of coastal zone governance in a single case and that it fails to explore the role of a specific element in depth. Grounded in the concept of collaboration, participation, and common interests as well as synergetic governance theory, this paper provides insights into the practical logic of coastal ec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and broadens the practical extension of social governance theory in the field of marine ecology. The findings offer valuable experience for other coastal areas to improve the ec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system, which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advancing China's marine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and strengthening its position as a strong maritime nation.

Article Type: Research Paper

Key Words: Coastal Zones, Ecosystem Governance, Multi-Stakeholder Participation, Synergetic Governance, Grounded Theory

(13) The Logic of Generation and Solidification of Grassroots Governance Mechanisms

——A Case Study of the Governance of Improper Exploitation of Natural Resources in Jinhaihu Town

Chen Jia, Yu Chang · 157 ·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Beijing Forestry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3, China)

Abstract ID: 1672-6162(2025)04-0157-EA

Abstract: Grassroots governments, positioned as the terminal nodes of the bureaucratic system, are the initial discoverers and direct responders to complex and diverse local issues. However, these entities face challenges such as insufficient resources, inadequate capabilities, and imbalanced responsibilities and authority, which hinder the enhancement of their governance capacity and efficiency. This study takes the grassroots law enforcement convening system for governing improper exploitation of natural resources in Jinhaihu Town as a case study, employing case-based deep description and process tracing methods to systematically present a comprehensive view of the mechanism innovation process and discusses the process and inherent logic of pressure drive, organizational collaboration, tool innovation and institutionalization on the formation and solidification of governance mechanism. The study finds that a problem-oriented approach is the core driver of grassroots government mechanism innovation. The "problem-driven" mechanism compels grassroots governments to innovate governance models and explore solutions in response to real dilemmas. However, this passive reaction mode underscores the limitations of the current governance logic, necessitating the exploration of strategies for transitioning from passive response to proactive optimization. In terms of mechanism design, the introduction of organizational arrangements such as the "deliberative coordination mechanism" and the "lead task system" effectively promotes coordination and integration in cross-sectoral governance scenarios. When potential "frictions" in inter-departmental collaboration arise, the "party-led government" organizational mechanism acts as a robust adhesive, effectively bridging bureaucratic barriers. By clarifying responsibilities, implementing precise empowerment, and optimizing resource allocation strategies, the vertical-horizontal relationships can be reconstructed, thus stimulating the latent vitality and innovative capacity of grassroots governance. Meanwhile,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institutional construction and digital technological tools is seen as a critical driving force for transitioning from traditional campaign-style governance to a long-term, stable regular governance paradigm, providing robust support for achieving governance modernization. It is crucial to focus on balancing the dual effects of standardization and diversity in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process, as well as maintaining innovative vitality while ensuring effective governance.

Article Type: Research Paper

Key Words: Grassroots Governance Innovation, Mechanism Generation, Mechanism Solidification, Institutionalization, Grassroots Law Enforcement Convening System